

This document is downloaded from 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 (OAPS), Run Run Shaw Libra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itle	泰國、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研究
Author(s)	Du, Yuan (杜媛)
Citation	Du, Y. (2017). 泰國、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研究 (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 (OAP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sue Date	2017
URL	http://dspace.cityu.edu.hk/handle/2031/90
Rights	This work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e work in any format is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Access is unrestricted.

泰國、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 研究

杜媛 (DU Yuan)

2017

摘要

爲了探討母語背景對漢語口語流利性的影響，本研究以來自泰國和坦桑尼亞當地漢語課堂的 20 名泰國小學生和 20 名坦桑尼亞小學生為實驗組、20 名中國小學生為對照組，定量和定性分析三組實驗者的七項漢語口語流利性發音指標（語速、發音時間比、平均停頓長度等），探討出泰語和斯瓦希里語兩種母語背景因素對學習者漢語口語流利性的影響。

本文分爲五章，第一章縱觀國內外有關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的研究歷史，首先明確了本實驗的口語流利性的操作性定義，然後總結了前人關於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的獲得、影響因素、定量分析等研究，從而確定了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設計實驗操作流程以及對實驗所要測量的語音指標進行確定。第三章按照泰國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坦桑尼亞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分類的方式從不同角度考察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差異。第四章重點探究本實驗的研究結果，發現泰國、坦桑尼亞小學生普遍具有較多次數的停頓、言語重複、更改等不自然的口語表現，而他們的語速和語流長度卻可以達到接近母語者的水平。此外，無論是中國小學生、泰國小學生還是坦桑尼亞小學生，男生的語速、發音速度都明顯快於女生。第五章是總結，並針對本研究的不足之處提供了今後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方向。

關鍵詞：漢語口語流利性；母語影響；性別因素；泰國和坦桑尼亞對外漢語教學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irst language on the Chinese speech fluency, we investigated 20 Thai pupils and 20 Tanzanian pupils from local primary school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20 Chinese pupils as control group. We measured their speech rate, phonation/time ratio, average length of pause, et al., the influences of first language (Thai and Swahili) on the Chinese speech fluency were discussed wi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wa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looked at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fluency in second language all around the world. First, it clarified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oral fluency in this experiment, and then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on L2 oral fluency acquisition, facto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so on, so as to determine the main direction and methods of this study. The second chapter used seven speech indexes to design the experiment in Thailand and Tanzania respectively. The third chapter examined the differences on speech fluency performance between Thai pupils and Tanzanian pupil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fourth chapter showed the result that Thai pupils and Tanzanian pupils generally had more times on the pause, repetition, changes and other unnatural oral performance than Chinese pupils, while their speech rate and mean length of speech run can be achieved as close as native speakers. In addition, boys' speech rate and articulation rate is faster than girls' whatever they come from. Last chapter is summary. Given that shortcomings of this study, there are still som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 words: Chinese speech fluency; first language effects; sex factor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hailand and Tanzania

目录

第一章 緒論.....	5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5
1.2 國內外研究綜述.....	6
1.2.1 口語流利性的定義和分類.....	6
1.2.2 口語流利性研究現狀.....	9
1.3 理論框架.....	13
1.3.1 對比分析假說.....	13
1.3.2 中介語理論.....	14
第二章 實驗研究設計.....	16
2.1 被試.....	16
2.2 實驗設計.....	16
2.3 實驗步驟.....	16
2.4 量化指標.....	16
2.4.1 時間性指標.....	17
2.4.2 表達性指標.....	19
2.5 停頓界定.....	20
第三章 泰國、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	21
3.1 泰國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	21
3.1.1 流利性測量指標.....	22
3.2 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	25
3.2.1 流利性測量指標.....	25
3.3 泰國、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的差異.....	28
3.3.1 流利性測量指標.....	28
第四章 實驗結果分析討論.....	32
4.1 學習者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分析.....	32
4.1.1 泰國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結果分析.....	32
4.1.2 坦桑尼亞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結果分析.....	33
4.1.3 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結果分析.....	35
4.2 針對漢語口語流利性的教學建議.....	36
4.2.1 給予重視， 加強訓練.....	36
4.2.2 建立體系， 量化測評.....	37
第五章 結語.....	38
參考文獻.....	39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近三十年來，漢語在東南亞、非洲等地區都受到越來越多的歡迎，湧現了大批從這些地區來中國學習漢語的留學生，尤其是開辦在泰國和坦桑尼亞的孔子學院和中文課堂日益發展壯大，成為海外開辦漢語課堂數量最多的兩個國家。這就要求我們漢語語言工作者對這些地區的教學情況深入瞭解，共同從教學實踐和理論研究這兩個方面重視這些地區對外漢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努力幫助這些地區的學習者學好漢語、學會說普通話、瞭解中國文化。所以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研究中既要考慮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被學習的語言特殊性，還要考慮到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學習者的群體特殊性。

第二語言高級使用者給人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他們能流利地運用外語進行交流，這是初級水平學習者與其最重要的區別。Fillmore (1979) 認為人們使用語言時表現出來的差異就是流利性的差異。¹ 評價一個人可以說一口“流利的外語”，這裏的“流利”就是一種廣義層面的理解。一個人在說話時，會出現語句都正確無誤也未必流利的情況，也會出現語法不準確、詞匯單一但卻很流利的情況，這裏的“流利”就是狹義層面的理解。Lennon (1990) 首次區分了口語流利性的廣義層面和狹義層面²，他的定義奠定了有關流利性研究的基礎，其後絕大部分二語流利性的研究都是從狹義的視角考察第二語言學習者流利性的表現。

然而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口語教學中，對學習者的認知特點的關注程度還不夠高，教學的效果還不甚理想。魯健驥 (2016) 認為對外漢語教學模式是針對一定的教學物件和教學目標，對教學所做的教學形式上的安排³，所以教學模式的建立服務於教學，服務於學習者，要建立在學習者的認知特點和規律上。主要表現在：

1. 重視發音訓練，忽視語感能力的訓練。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口語教學多是借鑒母語普通話教學的模式，系統講解漢語語音知識，大量的模仿練習以及教師糾錯。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說漢語時非自然停頓等情況會導致漢語語音產出的不流利，教學者如果忽視了這一語音認知特點，學習者就很容易產生焦慮的情緒 (張莉, 2001)。⁴

2. 缺乏差異性的口語教學。不同母語背景的學習者在漢語口語學習中存在不同的學習難點，發音和韻律習得存在不同的問題，然而目前的口語教學課堂多為“聯合國”式，尚未做到有針對性地進行口語訓練。另外，即便是同一母語背景的學習者在口語學習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韻律感知能力以及發音能力也存在差異，

¹ Fillmore, C. “On fluency.” In C. Fillmore, D. Kempler & W. Wang (ed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bility and Language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p85-101.

² Lennon, P. “Investigating fluency in EFL: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Language Learning*, 40:3(1990), pp387-417.

³ 魯健驥, <關於對外漢語教學模式的對話>, 《華文教學與研究》第1期(2016), 頁11-17。

⁴ 張莉, <留學生漢語學習焦慮感與口語流利性關係初探>, 《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2001.8), 頁44-49。

這在口語教學中也常常被忽視。⁵ (薛晶晶, 2017)

為解決上述對外漢語口語教學中的兩個主要問題, 本研究從學習者本身出發, 通過測量第二語言初級學習者的口語流利性指標(語速、平均語流長、停頓等), 分析泰國和坦桑尼亞的漢語初學者在口語產出任務中具有怎樣的個體差異表現, 從而為漢語口語的對外教學提供實驗依據和針對性的教學建議。本文研究思路由以下兩個問題展開: (1) 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表現有何差異? (2) 怎樣針對個體差異(不同母語背景、不同行不)提出教學建議? 文章最後將對這兩個問題做出總結性的回答。

1.2 國內外研究綜述

1.2.1 口語流利性的定義和分類

1.2.1.1 母語口語流利性

口語流利性是甚麼? 中外詞典中都給出了比較簡單且淺顯易懂的定義:《韋伯字典》(網絡版)將流利性定義為口語表達從容、快速且流暢;《新牛津英語詞典》(2001)的定義是言語行為等的從容準確;《美國傳統詞典》(第五版)則將其定義為能從容而有效地表達的能力;而《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給出的解釋是“話說得快而清楚”。可見,這些定義都只是整體描述性質的解釋,而口語流利性是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心理語言學界和語言教學界都很難給出統一而明確的定義。口語流利性最初是以 Lesson (1975) 和 Fillmore (1979) 為代表的學者從母語習得的角度界定的。

Lesson (1975) 關於口語流利性的定義是“說話人在接觸所說語言的有限材料的基礎上即可說出無限多個符合該自然語言音位、句法和語義的句子的能力 (the ability of the speaker to produce indefinitely many sentences conforming to the phonological, syntactical and semantic exigencies of a given natural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a finite exposure to a finite corpus of that language)”。⁶Chomsky 早在 60 年代就提出了“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 這一概念,是指人們所具有的包括語音、詞匯和語法的規則所構成的語言知識。Chomsky 尤其強調了具備語言能力的關鍵之處就在於能夠運用掌握的有限的規則創造出無限的句子。比較兩位學者觀點不難發現, Lesson 所謂的“口語流利性”就等同於 Chomsky 所謂的“語言能力”,他是從生成語言觀角度指出了“創造性”和“準確性”地使用語言可作為基本標準評價母語表達或外語運用。但 Lesson 的問題在於,他完全忽視了學習者要想習得流暢的表達/運用(performance)是需要經過時間量上的累積的,對口語流利性的闡述也太過寬汎。

更有影響力的一種定義是由 Fillmore (1979) 提出的,因為其後的第二語言流利性研究大多沒有超出他所定義的範圍。他認為流利性的差異就是不同的人使用語言時表現的差異,從言語產生的角度將流利性定義為使用母語時具備的四種能力:一是“以話語填充時間的能力(the ability to fill time with talk)”,

⁵ 薛晶晶,〈作為第二語言的漢語語音教學模式構建的認知基礎〉,《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第 1 期(2017),頁 97-99。

⁶ Lesson, R. “Fluency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5, p136.

就是說話者在一定時間內盡可能多的避免停頓而產出大量的句子，這反映了說話者大腦無意識、自動化地對語言進行監控的能力；二是“用連貫的、理念的、語義密集的句子說話的能力（the ability to talk in coherent, reasoned, and semantically dense sentences）”，Fillmore 用 Chomsky 的例子說明瞭流利性產出不僅要說話者有較少的“嗯、啊”等猶豫，還能夠用語義和句法複雜且合理的句子表達自身的想法，即口語的準確性；三是“在較寬範圍的場合駕馭合適話題的能力（the ability to have appropriate things to say in a wide range of contexts）”，體現了說話者面對各種題材都能有話可說、發揮穩定的交流能力，即口語的得體性；四是“在語言使用中具有創造性和想像力的能力（the ability to be creative and imaginative in language use）”，即口語的創造性。⁷Fillmore 的“四分法”暗示了語言和知識的相互作用，奠定了此後評價流利性四個方面的基礎。雖然相較於 Lesson 的定義，Fillmore 對口語流利性的闡述更為系統，但他也似乎過於理想化，忽略了人們在使用語言時會收到生理、心理、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由此可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對口語流利性的界定並未完善，但它們對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的定義卻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1.2.1.2 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

對於一個大腦和發音器官正常的人來說，在母語習得中達到口語的流利性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在第二語言的習得過程中，口語流利性卻是衡量學習者口語能力高低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Brumfit (1984), Faerch et al. (1984), Sajavaara (1987), Lennon (1990), Schmidt (1992), Crystal & Varley (1993), 張文忠 (1999), Segalowitz (2010), 翟艷 (2011) 等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第二語言流利性進行了界定。

Brumfit (1984) 認為口語流利性既存在於說和寫，即言語產出中，也存在於聽和讀即言語聽辨中，是“對所習得的語言系統最大限度的有效運作（the maximally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language system so far acquired by the student）”。⁸Faerch 等人 (1984) 則認為口語流利性的概念是相對的，具體表現在第二語言學習者輕鬆自如地表達思想的能力。他們首次將流利性劃分為語義流利性、詞匯-句法流利性和發音流利性，啟發了後來學界定量測量流利性的不同指標的確定。⁹Sajavaara (1987) 提出“流利性即言語行為的交際可接受性（communicative acceptability），或者說交際合適性，而言語必須符合該語言社團的期望，且屬於正常的、可接受的、輕鬆的語言行為。”¹⁰在他看來，二語學習者除了需要具備一定的語言知識技能外，還要瞭解該語言的社會文化背景即具備語用能力。因此至少要從言語的可接受性和流暢性兩個方面來考察口語流利性，這與 Bachman 的語言交際能力相吻合。但這樣的定義並沒有太多的創新性，因為在 Fillmore 提出的母語的口語流利性應當具備的四種能力中，第一個

⁷ Fillmore, C. “On fluency.” pp85-101.

⁸ Brumfit, C. *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 Roles of Fluency and Accuracy*, pp20-131.

⁹ Faerch, C., Haastrup, K. & R. Phillipson. *Learner Language and Language Learning* (Multilingual Matters L TD, 1984), pp11-187.

¹⁰ Sajavaara, K. “Second language speech production: Factors affecting fluency.” In Dechert and Raupach (eds.), 1987, pp55-109.

“用話語來填充時間的能力”和第三個“在各種不同的語境中合適表達的能力”正是可接受性和流暢性的體現。

真正具有創新性的定義來自 Lennon (1990) 對口語流利性的定義。他從聽話者角度出發提出了流利性是說話者傳達資訊的能力，並讓聽話者能夠集中注意到這種言語表現行為上而不是去關注說話人語言知識的運用，是聽話人對說話人的言語計劃和言語產出的印象。Lennon 不贊同先前學者將詞匯多樣、句法正確和語言得體這些語言知識統統歸入口語流利性，他明確表示要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理解流利性。廣義的口語流利性可以看作是說話者整體的口語水準，比如評價一個人可以說一口“流利的外語”，這裏的“流利”就是一種廣義層面的理解。狹義的口語流利性表示口語能力其中的一個方面，往往與口語的準確性、多樣性、得體性等區分，更加關注說話者的語速、停頓、重複、更改等語音特徵。¹¹此後 Schmidt (1992) 跟 Lennon 的觀點類似，認為祇有真正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對語言進行有效處理，這樣的“自動化的程式性技能 (automatic procedural skill)”才能被稱之為口語流利性。¹²Crystal & Varley (1993) 描繪狹義的口語流利性時，認為這一術語意味著“口語表達的輕鬆和快速，是一段具有較少停頓的連續語流 (continuous flow)”。¹³一個人在說話時，會出現語句都正確無誤也未必流利的情況，也會出現語法不準確、詞匯單一但卻很流利的情況，這裏的“流利”就是狹義層面的理解。

國內口語口語流利性研究的奠基人張文忠 (1999) 在總結國內外學者關於口語流利性定義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口語的流利性除了包括學者們公認的流暢連續性和可接受性這兩項特性以外，還應該加上連貫性這一特徵，將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定義為使用一種可被接受的第二語言變體，流暢、連貫地表達思想的能力，並且這種流暢性、連貫性和語言可接受性可以被言語聽辨者所感受到。¹⁴翟艷 (2011) 從教師評分標準的角度，將口語流利性劃分為聽感、意義表達、語言形式等三個維度五個方面，對流利性的聽辨與分析更為細緻和真實。¹⁵由此看來，張文忠和翟艷都是採用廣義流利性的定義。

Segalowitz (2010) 進一步對狹義的流利性進行細分，從話語流利性 (utterance fluency)、感知流利性 (perceived fluency) 和認知流利性 (cognitive fluency) 這三個角度考察第二語言流利性。¹⁶如圖 1-1 所示。話語流利性就是定量研究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的語音特徵，關注語流本身及其輸出過程，其本質是對言語的時間性語音特徵 (temporal acoustic measures) 進行計算。感知流利性就是聽話者對說話者言語的一種印象，是聽話者的主觀判斷。Lennon (1990) 曾提到，口語流利性是說話者通過完整的語言成果吸引聽話者注意的能力，是聽話者對說話者的言語計劃和言語輸出的印象。¹⁷認知流利性主要考察說話者內在的言語計劃 (planning)、生成 (articulating) 和監控 (monitoring) 過程。說話者處理詞匯的速度越快、越穩定，對語法結構掌握得

¹¹ Lennon, P. “Investigating fluency in EFL: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pp387-417.

¹² Schmidt, 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econd Language Fluency.”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4:3(1992), pp357-385.

¹³ Crystal, D. & R. Varley,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athology*(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Press, 1993), pp25-67.

¹⁴ 張文忠, <國外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研究現狀>,《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2 期 (1999.2), 頁 41-48.

¹⁵ 翟艷, <口語流利性主觀標準的客觀化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5 期 (2011), 頁 7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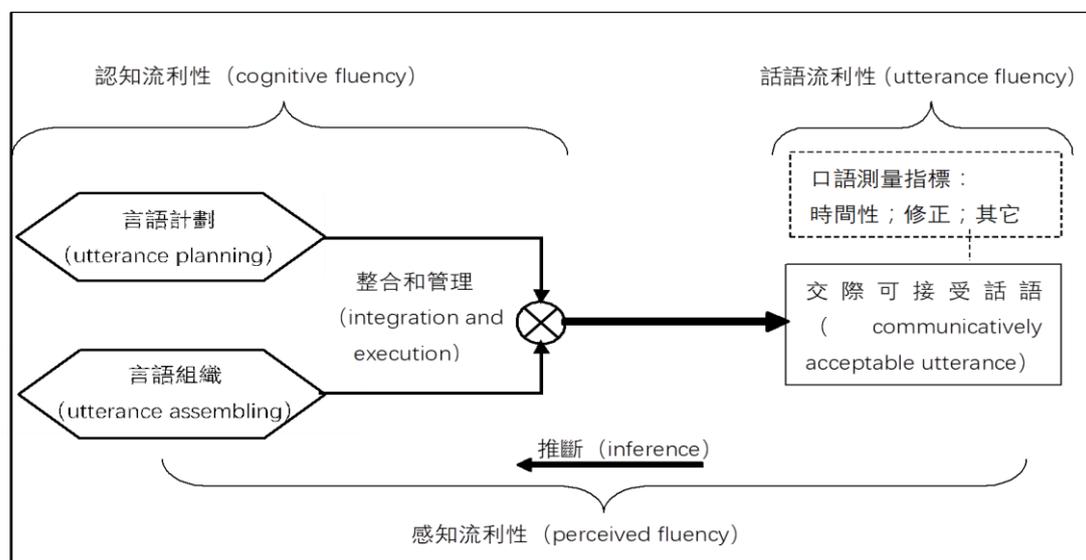
¹⁶ Segalowitz, N. *Cognitive Bases of Second Language Fluency*(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34-60.

¹⁷ Lennon, P. “Investigating fluency in EFL: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p399.

越靈活，其認知流利性水準越高。

本研究主要考察漢語口語的話語流利性表現，從語速、發音時間比、停頓時長、修改次數等語音指標定量測量兩個國家小學生的漢語口語表現。故本文的研究對象不包括對學習者主觀感知的整體流利性水平的測量，也不包括對學習者發音、詞匯、句法使用的準確度和複雜度的評判，僅僅是從客觀統計數據來分析初級漢語學習者在綫處理口語發音的能力。

圖 1-1 話語流利性、感知流利性和認知流利性的範圍



注：圖片來自 Segalowitz, N. *Cognitive Bases of Second Language Fluency*, p50.

1.2.2 口語流利性研究現狀

1.2.2.1 口語流利性的獲得方法

口語流利性在第二語言習得中佔有重要地位，那麼如何才能獲得口語流利性呢？套語的記憶與練習以及話語內容的複述是學術界中大家普遍認同的口語流利性的獲得方法。

套語是人們在日常交往中使用特別廣泛的言語行為。雖然語言界對套語的定義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但是大多數學者認為，套語是指人們在長期的語言交際過程中形成的固定的或公式化的慣例語，是程式化或現成的語言材料，例如：“久仰”、“哪裡哪裡”和“吃了嗎”。

套語是語言教學中常用的一種方法。因為套語符合語言使用的經濟原則，能讓學習者在最短的時間內使用所學知識，減輕資訊處理的壓力，從而增強口語的流利性。Fillmore (1979) 認為適當地使用套語有助於實現語言的流利性。¹⁸Brumfit (1984)、Weinert (1995) 和 House (1996) 等人都贊同 Fillmore 的觀點。Brumfit (1984) 指出，套語雖然是為提高口語流利性而服務的，但是也要配合為提高準確性而設計的活動。¹⁹Weinert (1995) 在肯定了套語對語言流利

¹⁸ Fillmore, C. "On fluency." p204.

¹⁹ Brumfit, C. *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 Roles of Fluency and Accuracy*, p102.

性發展的作用後，也強調套語對語言準確性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²⁰而 House (1996) 進一步肯定了套語在口語流利性發展上的作用和地位後，還提出使用套語既是外語學習策略，也是言語交際策略。²¹

除了套語外，複述也是一種獲取口語流利性的重要途徑。根據 Levelt 的言語產出模式，程式性知識和資訊提取的自動化可獲得口語流利性。因此 Mackey (1965) 認為，重複“能強化已學的模式並使它們成為習慣或技能。一旦這些模式建立起來，它們就能抵制可能出現于心理中的任何矛盾的模式之干擾，學習第二語言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²²在 Mackey 看來，重複形式中最基本的莫過於機械型重複，即將結構、語調、俗語和套話等用完全相同的形式不斷重複。除此之外，還要配合擴展型重複、變化型重複和運用型重複一起使用，才能在交際中表達流利順暢。

Goldman Eisler, F (1968) 首次運用實驗來考查重複練習作用。他讓被試重複在無時間限制的情況下描述同一幅漫畫多達六次，結果發現，隨著重複次數的增加，被試描述的內容增多，而停頓時間卻減少了。²³Hieke (1981) 則對二十九位英語學習者進行了長達十二周的聽念練習測試。在轉寫並分析了相關錄音後，他發現從第一周到第十二周，學習者在聽念練習中的語速逐漸增加而猶豫等現象逐漸減少。²⁴而 Maurice (1983) 設計了一種重複練習法——4/3/2 訓練法。他讓被試分別面對三個不同的物件講述一件內容相同的事情，其中每次講述時間呈四分鐘、三分鐘、兩分鐘遞減。研究發現，在時間遞減的同時，被試在口語上的流利性和準確性卻能達到越來越高的水準。²⁵

因此，無論是套語還是複述都是語言學習中有效的方法，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學習者的熟練度，從而增進口語流利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進行重複練習時，應當多使用創造性的交際重複而非機械的、缺乏交際的重複。

1.2.2.2 口語流利性的影響因素

在習得母語時，學習者處於母語環境下，即使不通過課堂語法教學也能完全掌握。與母語學習不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非目的語環境下學習，即使經過系統的語法知識學習，也難以達到母語學習者的流利水準。因為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並非一成不變的，還會受到習得、認知、年齡甚至是言語計畫和任務類型等因素的影響。

從二語習得角度來看，Krashen (1982) 指出是否能獲得流利性，關鍵在於說話人對其語言產出的監控力度。如果過度監控，語言生成和產出就會變慢，最

²⁰ Weinert, R. "The role of formulaic langua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eview". *Applied Linguistics*, 16: 2(1995), pp180-205.

²¹ House, J. "Developing pragmatic fluency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8: 2(1996), pp225-252.

²² Mackey, W. F. *Language Teaching Analysis*. Longman Group. Translated by Wang Dexing et al. (1990), Beijing Languages Institute Press, 1965, pp87-132.

²³ Goldman Eisler, F. *Psycholinguistics: Experiments in Spontaneous Speech*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68), p89.

²⁴ Hieke, A. E. "Audio-lectal practice and fluency acquisition."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4: 3(1981b), pp189-194.

²⁵ Maurice, K. "The fluency workshop." *TESOL Newsletter*, 17: 4(1983), p29.

終導致語言的缺失。²⁶

從認知的角度來看，缺少必備的語言知識會讓學習者難以流利交際。Lesson (1975) 認為，語言產出主要包括策略、生成和整合三個層次。無論哪個層次上的編碼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到表達的流利性。²⁷

從心理的角度來看，不良的心理因素對口語流利性有負面影響。Faerch 等人 (1984) 認為表達不流利是因為語言產生過程中有障礙，可能因為性格內向、沒有把握、不自信等導致不敢開口。²⁸對外漢語界張莉 (2001) 則通過實驗證實了留學生漢語學習焦慮感與口語流利性之間呈負相關，即焦慮感越大，留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越糟糕。²⁹

從言語計畫和任務類型的角度來看，Foster、Skehan (1996) 研究發現，如果能事先對任務進行熟悉和計畫，流利性就會有一個質的飛躍。這表明言語計畫和任務類型對流利性的影響最大，結構複雜性和語言準確性次之。³⁰

實際上，學習者二語學習中年齡的差異主要是由於認知方式上的差異造成的，所以對語音習得認知方式的研究也是非語音層面研究的一個有趣探索。孩子和成人在習得二語語音時，認知方式上存在差異的假設得到了實驗的證實 (Pilar et al., 2012)。認知理論的研究發現，孩子學習第二語言因為認知能力尚未完善，主要是以模糊的、含蓄 (explicit) 的知識輸入方式進行學習，就語音而言，通過大量的輸入和簡單的模仿進行學習，在此過程中不斷形成語音對立即二語新的語音範疇。成人在學習第二語言時，認知能力已經完善，而且第一語言的語音系統已經成立，所以第二語言學習的認知方式與兒童不同，更多地通過明確、清晰 (implicit) 的規則進行學習，就語音習得而言，在接觸二語的語音片段之初，首先會受到母語語音系統的篩選 (filtering)，如果與母語語音片段的差異大，就容易獲得，如果差異小也就是相似度大，那麼就難以獲得。成人在語音的學習機制上與兒童存在較大的差異，加工的過程更加複雜，所以就更難以習得。³¹

本實驗的考察對象是高年級小學生，實驗結果明顯不同于以往都以成年人作為實驗對象的研究。年齡等非語言因素對二語語音習得產生何種影響的研究存在較大爭議，且研究過程不易控制變數，研究結果多有分歧，這些弊端導致更多的研究者將二語語音習得研究的目光轉移到了語言因素上，即學習者的母語語音系統對二語語音習得的影響。語言層面的影響主要是學習者的語音經驗，包括第一語言 (即母語) 的語音經驗，也包括第二語言的語音經驗。學習者母語的語音系統對二語的語音學習既有積極作用也有干擾作用。

本研究涉及口語流利性的影響因素有母語背景 (泰語和斯瓦希里語) 和性別 (男生和女生)。關於母語背景的對流利性影響的研究少之又少，Tracey M. D. 等人 (2009) 曾對比了漢語母語者和斯拉夫語母語者學習兩年英語的過程中 L1 和 L2 的流利性是否相關，實驗結果顯示 L1 為斯拉夫語的英語學習者比 L1 為漢

²⁶ Krashen, 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Pergamon Press, 1982), p156.

²⁷ Lesson, R. "Fluency and Language Teaching." p136.

²⁸ Faerch, C., et, al. *Learner Language and Language Learning*, p111.

²⁹ 張莉, <留學生漢語學習焦慮感與口語流利性關係初探>, 頁 44-49.

³⁰ Foster, P., Skehan, P., "The Influence of Planning and Task Type on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8(1996), pp299-323.

³¹ Pilar A., Jason Z. & Artturo E. H. "Age of Acq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in a second language independently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non-native speech."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5(2012), pp190-201.

語的英語學習者表現出顯著的口語流利性水平的提高，這個研究體現了母語跟第二語言相似（都沒有聲調）的學習者的口語流利性更容易習得。³²本實驗假設在泰語和漢語都是聲調語言的前提下，泰國小學生的口語流利性表現應該會更好。

陳默（2012）首次將性別因素引入到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研究中，她探討了中高級漢語水平的美國發音人八項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的發展，研究發現中級水準學習者的無聲停頓時長性別差異顯著，而充實停頓時長無顯著性別差異。高級水準學習者的無聲停頓時長以及充實停頓時長性別差異顯著。男性學習者停頓時長的發展隨著語言水準的提高而進步，但是女性學習者停頓時長的發展略微退步。³³本文不同的是並沒有從歷時的角度考察口語流利性的性別發展，而是在漢語母語者為對照組的同時分析性別表現差異的認知心理因素。

1.2.2.3 口語流利性的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有助於認識學習者在口語流利性上的進步，並為評判口語流利性提供客觀標準。如何測量流利性向來也是語言學界爭論的焦點，重點是如何在操作層面上，實現對流利性客觀的定量測評。

大多數學者均認可時間性指標是評價口語流利性的首要指標。Lennon(1990)在時間變數的發展基礎上，提出了十二項可量化指標來測量口語的流利性。在十二項指標中，最能說明流利性的是語速、每個正確單位內經填補的停頓次數和停頓前正確單位數的比例，而這也表明了流利性和停頓、重複等出現頻率有著重要的關聯。³⁴

Arevart、Nation（1991）使用了語速（Speech Rate）和猶豫次數（Number of Hesitations）兩項指標對被試進行口語流利性實驗，並發現這兩項指標和口語流利性有著高度相關性。³⁵他們的實驗研究有力地支持了Lennon的結論。

Towell、Hawkins、Bazergui（1996）對流利性的時間性指標進行擴展，變成了五項指標，即語速（Speech Rate）、平均停頓長（Average Length of Pause）、發音時間比（Phonation / Time Ratio）、平均語流長（Mean Length of Speech Run）和發音速度（Articulation Rate）。之後，他們使用這五項指標考察了十二名學習法語的英國學生，發現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無間斷語流長度和結構的複雜性。³⁶

此外，Foster、Skehan（1996）在實驗中考察了被試的每百音節更改次數（Numbers of Repairs per 100 Syllables）和被剔除的音節數占總音節的百分比（Ratio of Pruned Length to Total Length），同時還使用了平均C-單位（剔除後）長度（Mean Length of C-unit After Pruning）和平均T-單位內從句數（Subordinate Clause per T-unit）兩項指標。他們從言語表達的角度對流利性進行實證研究，並測量了屬於流利性範疇的句法複雜性。³⁷

³² Tracey M. D., Murray J. M., Ronald I. T., Marian J.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Fluency and L2 Fluency Development." *SSLA*, 31(2009), pp533-557.

³³ 陳默, <美國留學生漢語口語產出的流利性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2012),頁17-24.

³⁴ Lennon, P. "Investigating fluency in EFL: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p402.

³⁵ Arevart, S., Nation, P. "Fluency Improve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 *RELC Journal*, 1(1991), pp84-95.

³⁶ Towell, R., Hawkins, R., Bazergui, N., "The Development of Fluency in Advanced Learners of French." *Applied Linguistics*, 17:1(1996), pp90-101.

³⁷ Foster, P., Skehan, P., "The Influence of Planning and Task Type on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 pp311.

而張文忠、吳旭東（2001）在測量國內大學生英語口語能力發展時，使用了四小類十二項指標，即時間性指標（語速、發音時間比、發音速度、平均語流長和平均停頓長）、內容指標（所述必要事件與全部必要事件之比）、語言指標（無錯誤 T-單位元與全部 T-單位元之比、平均 C-單位（剔除後）長度、平均 T-單位內從句數）和表達性指標（每百音節更改次數、改述和替代與全部更改之比、剔除的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³⁸

周愛潔（2002）研究 4/3/2 訓練法對提高英語口語流利性的影響時，完全採用了 Towell 等人和張文忠在研究中所使用的五項時間性指標（語速、發音速度、發音時間比、平均語流長度和平均停頓長度）和一項準確性指標（無錯誤 T-單位元與全部 T-單位元之比）。³⁹不過繆海燕和孫藍（2006）在研究句子構造框架的使用與二語口語流利性的關聯時，只採用了五項時間性指標（語速、發音速度、發音時間比、平均語流長度和平均停頓長度）。⁴⁰

對外漢語界中，郭修敏（2007）在考察漢語學習者的口語流利性情況時，在前人五項時間性指標的基礎上增加了平均發音長度這一指標。因此，他採用了六項時間性指標、兩項語言準確性指標和三項語言表述指標，對三十份 HSK 高等口試錄音帶進行研究，其結果與口試成績呈正相關，證明瞭各項指標尤其是時間性指標非常適合作為評判口語流利性的量化指標。⁴¹

陳默（2012）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不同的角度對漢語水準為中高級的美國留學生的漢語口語進行了考察。她所用的量化指標是節奏變數（即語速、無聲停頓頻率、無聲停頓時長和平均語流長度）以及遲疑特徵（充實停頓頻率、充實停頓時長、重複頻率和修正頻率）。⁴²

本研究在參照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口語流利性的操作性定義為能夠在口語交際中表達從容流暢，並能被聽辨者認可和接受的能力，具體表現在五項時間性指標和兩項表達性指標上的得分。

1.3 理論框架

1.3.1 對比分析假說

對比分析假說（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CAH）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領域曾經佔有重要的地位。對比分析假說是在預測和解釋二語習得偏誤時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它強調通過對比兩種語言結構的異同，來預測二語習得難點及容易產生的偏誤。母語遷移理論正是基於這一研究方法而建立的一種學習模型。這種理論認為，在二語習得過程中，學習者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母語的習慣，因此必然存在母語的遷移問題。遷移指在學習過程中已獲得的知識、技能對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的起到積極的作用，叫正遷移，

³⁸ 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現代外語》第 4 期（2001），頁 341-351。

³⁹ 周愛潔，〈論 4/3/2 活動對提高英語口語流利性和準確性的影響〉，《外語教學》第 9 期（2002），頁 78-83。

⁴⁰ 繆海燕，孫藍，〈句子構造框架的使用與二語口語流利性發展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9 期（2006），頁 265-271。

⁴¹ 郭修敏，〈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口語流利性量化測評〉，《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7 期（2007），頁 91-94。

⁴² 陳默，〈美國留學生漢語口語產出的流利性研究〉，頁 17-24。

有的起阻礙的作用，叫負遷移（劉珣，2000）。⁴³傳統的遷移理論認為，兩種語言結構特徵的相似導致正遷移，兩種語言的差異導致負遷移，負遷移造成二語習得的困難和學習者的偏誤，如果兩種語言的差異越大，學習者的困難也就越大。很多學者的研究顯示，語言遷移不是一個“或有或無”的現象，語言遷移是二語語言學習過程中客觀存在的。

從上個世紀60年代末開始，傳統的對比分析假說受到質疑和批評。學者們發現兩種語言間的差異並不一定帶來負遷移，母語和二語之間的相似性也不一定帶來正遷移，可能會導致負遷移（Ellis, 1999），正負遷移出現的條件還有待於進一步考察。⁴⁴比如日語的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濁對立而無送氣對立，漢語普通話則相反，CAH 可以預測日本學習者在學習漢語普通話送氣輔音時存在困難。但是，英語音系中也只存在清濁對立，無送氣對立，但是英語母語的學習者學習漢語的送氣與不送氣對立時並無困難，這樣的情況CAH是無法做出解釋和回答的。所以，過於簡單和抽象的母語-二語音系對比對於二語語音偏誤的預測能力是相當弱的，這一點才是CAH 的致命弱點所在（王韞佳，2008）。⁴⁵

1.3.2 中介語理論

本文主要採用此理論框架下的對比分析法和偏誤分析法來進行研究。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中，研究者們一般認為中介語（interlanguage）這個概念首先是 Selinker, L（1969）提出來的。根據塞林克的說法，“中介語”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特有的一個語言系統，從結構上來看，這種語言系統處於母語和目的語的中間狀態，具有過渡性。即這種語言系統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會隨著語言學習者學習進程的推進而逐漸靠攏於目的語的“正確形式”，並且最終達到“正確形式”。⁴⁶

塞林克認為，中介語產生的根源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或者說是“五個中心過程”：

（1）語言遷移。語言遷移即二語學習者把母語的規則應用到二語習得的過程中，對目的語學習產生積極或者消極的影響，從而形成正遷移或者負遷移；

（2）目的語規則的泛化，即學習者在二語學習過程中把某些目的語規則的過度概括使用；

（3）訓練遷移，主要是由教師教學方式不當或者教材內容不當引起；

（4）第二語言的學習策略，策略的具體表現形式包括簡化、省略、替換等；

（5）第二語言的交際策略。此策略包括接受和表達量方面，反映了學習者不同階段的發展水平。⁴⁷

在塞林克的理論中，語言轉移是中介語最重要的根源，在中介語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以上的五個過程結合起來構成了語言學習者內化的第二語言系統，

⁴³ 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68。

⁴⁴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 pp33-35.

⁴⁵ 王韞佳，〈跨語言語音對比與L2語音習得——CAH、PAM和SLM 述評〉，北京：《第八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暨慶賀吳宗濟先生百歲華誕語音科學前沿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

⁴⁶ Selinker, L., *Rediscovering Interlanguage* (Longman, 1992), pp45-120.

⁴⁷ 付有杰，鄒長梅，〈塞林克和他的“過渡語”理論〉，《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1996），頁74-75。

有的研究者也把它們總結為母語遷移、語內遷移和交際遷移。

本文研究泰國和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 最主要是從個體差異的角度來考察分析母語背景和性別對漢語口語流利性的影響。我們不能否認這兩個國家的學生學習漢語的過程中, 目的語規則的泛化、對目的語規則的回避等因素同樣會對中介語語音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具體偏誤的成因也不可能是單一的, 結合實際的教學情況來看, 學習者的年齡、學習能力、學習態度、學習目的、社會閱歷、生活環境等諸多因素同樣也會對中介語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第二章 實驗研究設計

2.1 被試

由於筆者有幸得到三位漢語教師的幫助，本研究根據漢語教師分別在三個國家的當地漢語課堂（中國北京市第三小學、泰國曼谷孔子學院和坦桑尼亞孔子學院）採樣的方法，保證了實驗的真實性和有效性。60 個被試的年齡、性別均一致，分別為中國四年級小學生 20 人、泰國六年級小學生 20 人以及坦桑尼亞六年級小學生 20 人三組。每組均有女性 10 人、男性 10 人，年齡均在 10-15 歲之間。泰國和坦桑尼亞的小學生被試均為初級水平學習者，有一年的漢語課堂學習經驗，掌握拼音認讀和基礎口語表達。漢語教師作為志願者被派到當地教授漢語一年，學生接觸漢語的頻率為每週一節的漢語基礎課。中國被試來自北京本地小學生。

2.2 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為 3×2 的二因素被試間實驗，用 R 語言做雙因素方差分析。A 因素是母語背景 (L1)，是三個被試間變量，分別為漢語、泰語和斯瓦西裡語。B 因素是性別，是兩個被試間變量，分別為男性和女性兩個水準。因變量是五個時間性指標和兩個表達性指標的測量數據。

2.3 實驗步驟

考慮到外國小學生是初級漢語水準，難度較大的任務會影響測量結果的效度和信度，本研究選擇“談愛好”這個話題進行口語流利性測試實驗，並且給每位實驗者提供帶有提示詞的文本。研究發現口語測試話題範圍越固定越好，保證測量的方便有效。每一位被試有大約三分鐘的準備時間，漢語教師統一進行指導 (instruct)，包括向泰國和坦桑尼亞小學生示範合乎語法的語句表達。錄音在安靜的教室中進行，用 Praat 語音軟件進行錄音，語音樣本都為 16 位單聲道的錄音，語音採樣率為 44100HZ。對被試的口語產出進行一至兩分鐘的錄音後，對語料進行標注和轉寫，並在 Excel 軟件中統計流利性特徵數據。

2.4 量化指標

從上述文獻可得知，測量流利性的指標包括時間性指標、內容指標、語言指標（準確性、複雜性）和表達性指標等四大類指標，體現了流利性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根據研究目的、被試具體情況和漢語本身的特點，本研究選取了五個時間性指標和兩個表達性指標。翟艷（2011）將語言形式上的準確性定義為語音的可辨認性、詞匯句法的可理解性，以及沒有詞法和句法規則上的錯誤。⁴⁸對漢語初級水準的泰國和坦桑尼亞小學生而言，漢語的發音很難把握，而且漢語在語音錯

⁴⁸ 翟艷，〈口語流利性主觀標準的客觀化研究〉，頁 79-86。

誤上的容忍度遠比詞、句錯誤要高；其次，漢語詞劃分操作比較複雜，對句子和詞匯的準確性和複雜性的考察也難以實現。因此本研究捨去語言指標這一類的測量，使用兩小類七個指標來考察二語流利性產出，如表 2-1。

表 2-1 本研究中使用的流利性指標

指標類型	指標名稱及定義
時間性指標	語速 (SR): 一個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和產生該言語樣本所需的時間總量 (包括停頓在內) 之比乘以 60, 表示為分鐘。
	發音速度 (AR): 用於發出所有音節的總時間內平均每秒所發出的音節數, 表示為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與用於發這些音節所需要的時間總量 (除去停頓) 之比。
	發音時間比 (PTR): 用於發音的時間總量 (除去停頓) 與用於產生該言語樣本所需的時間總量之比。
	平均語流長 (MLR): 所有每兩次達到或者超過 0.3 秒停頓之間的語流的平均長度, 表示為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與所有達到或者超過 0.3 秒停頓的總次數 (除首尾外) 之比。
	平均停頓長 (ALP): 所有達到或者超過 0.3 秒停頓的時間總量與停頓次數 (除首尾外) 之比。
表達性指標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R100): 包括重複、替代、改述、猶豫和錯誤啟動五項更改頻數與言語樣本總音節數之比, 再將得到的數值乘以 100。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RPL): 言語樣本中無助於理解言語內容的音節數與言語樣本總音節數之比。

2.4.1 時間性指標

2.4.1.1 語速

語速 (Speech Rate 簡稱 SR) 是指一個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和產生該言語樣本所需的時間總量 (包括停頓在內, 表示為秒) 之比。通常的做法是將所得結果乘以 60, 表示為每分鐘發出的音節數。⁴⁹其公式表達為:

$$\text{語速 (SR)} = \text{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 \div \text{言語樣本所需時間總量 (包括停頓在內)} \times 60$$

例如: 63 個音節 \div 70 秒 \times 60 = 54 個音節/分

語速表示被試在其講述的全部時間內平均每分鐘發出的音節數。如果被試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減少停頓, 提高有效音節的產出, 那麼可以說他的語速有所加快也意味著他在語速上獲得了流利性。但是如果音節間產生了頻繁的停頓而音節數卻增加了的話, 被試的語言流利性就會大打折扣了。

2.4.1.2 發音速度

發音速度 (Articulation Rate, 簡稱為 AR) 是指發出所有音節的總時間內平均每秒所發出的音節數, 表示為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與用於發這些音節所需的

⁴⁹ 張文忠, 吳旭東, <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 頁 341-351。

時間總量（除去停頓）之比。⁵⁰其公式表示為：

發音速度（AR）= 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 ÷ 發音時間總量（除去停頓）

例如：222 個音節 ÷ 105.58 秒 = 2.1 個音節/秒

發音速度主要是測試被試在進行語言輸出時每秒鐘所發出的音節數。但是，由於發音速度的測量是采用有效的發音時間進行的，并非采用整個言語樣本的時間總量，也就是說這個公式並沒有將停頓的時間計算在內。因此哪怕每秒鐘所產生的音節數量再高，只考慮發音速度的話也還是不能準確地測量口語流利性，因為被試有可能在講述過程中產生了較為頻繁或較長的停頓。

2.4.1.3 發音時間比

發音時間比（Phonation/Time Ratio，簡稱為 PTR）表示用於發音的時間總量（除去停頓）與用於產生該言語樣本所需的時間總量之比。⁵¹其公式表示為：

發音時間比（PTR）= 發音時間總量（除去停頓） ÷ 言語樣本所需的時間總量之比

例如：105.58 秒 ÷ 180 秒 = 0.59

上述公式中，言語樣本發音時間比祇與停頓時間和言語輸出的發音時間相關，並沒有涉及到音節的計算，也不受發音速度的影響。但如果被試的停頓時間過長，那麼其發音時間比和發音速度就會下降，呈負相關。

2.4.1.4 平均語流長

平均語流長（Mean Length of Speech Run，簡稱為 MLR）指的是所有每兩次達到或超過 0.3 秒停頓之間的語流的平均長度，表示為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與所有達到或超過 0.3 秒停頓的總次數（除首尾外）之比。⁵²其公式表示為：

平均語流長（MLR）= 言語樣本的音節總數 ÷ （所有達到或超過 0.3 秒）總停頓次數

例如：222 個音節 ÷ 53 次 = 4.19 個音節/語流

從公式中可以看出，平均語流長和發音時間比一樣，也和停頓時間的長短有關。每兩個停頓之間的音節數越少，說明該被試的話語越支離破碎和斷斷續續；相反，如果每個語流間的音節數比較多，就說明該被試的綫性語言處理能力比較強。

2.4.1.5 平均停頓長

平均停頓長（Average Length of Pause，簡稱為 ALP）指所有達到或超過 0.3 秒停頓的時間總量與停頓次數（除首尾外）之比。⁵³其公式表示為：

平均停頓長（ALP）= 總停頓時長 ÷ （所有達到或超過 0.3 秒）總停頓次數

例如：74.42 秒 ÷ 53 次 = 1.4 秒/次

平均停頓長主要是考察停頓所導致的非流利性，即考察在達到或超過 0.3 秒停頓的時間內被試語言輸出的平均停頓長度。Towell、Hawkins 和 Bazergui（1996）曾說過，口語流利性的測量不能忽視個體停頓時長。⁵⁴這說明僅僅使用

⁵⁰ 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頁 341-351。

⁵¹ 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頁 341-351。

⁵² 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頁 341-351。

⁵³ 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頁 341-351。

⁵⁴ Towell. R.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fluency in advanced learners of French." pp84-119.

語速、發音時間比等上述四項指標來測量口語流利性是不全面的，還必須加上對平均停頓長的考察。因此，口語流利性在平均停頓長上的表現為：“每次停頓的時間越少，被試用於言語計畫的時間越少，表達越流利。”

2.4.2 表達性指標

2.4.2.1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Numbers of Repairs per 100 Syllables, 簡稱 R100) 是指包括重複、替代、改述、猶豫和錯誤啟動五項更改頻數與言語樣本總音節數之比，再將得到的數值乘以 100。其公式表示為：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R100) = 五項更改頻數 (重複、替代、改述、猶豫和錯誤啟動) ÷ 言語樣本總音節數 × 100

例如：12 次 ÷ 222 個音節 × 100 = 5.41 次/百音節

張文忠、吳東旭 (2001) 指出，五項更改頻率是指：“改述，具體表現為重複說出片語或句子，主要指重複時對句法、詞形或詞序有改動；替代，具體表現為用一個詞語取代另一個剛說出的詞語；錯誤啟動，具體表現為話語沒有說完但不順著已經說出的內容繼續，其後可以有也可以沒有改述；重複，具體表現為單詞、片語或句子被重說一遍，且不對句法、詞形、或詞序作任何改動，但是在計算重複頻數時，不包括為了修辭效果而所作的重複；猶豫，具體表現為在一次性說出完整的單詞之前，一次或多次發出該單詞的首個或幾個音素或音節。”⁵⁵

由於上述概念是基於英語而產生的，因此在將其引入到漢語中時，必須結合漢語自身的特點進行完善改進：在“改述”和“重複”現象中，沒有詞形變化這一項；而“猶豫”在漢語中則表現為在一次性說完整個字或詞之前，一次或多次發出該字的聲母或者是雙音節詞或多音節詞的首字或前幾個字。例如：

改述：“爸爸，嗯，在時，在家時”中的“在時”改述為“在家時”；

替代：“我喜歡，嗯，學，學習”中的“學”被“學習”所替代；

錯誤啟動：“同學，我，我喜歡，嗯，看電視。”中的“同學”就屬於錯誤啟動；

重複：“老師，在學校時，不喜歡，聽音樂，聽音樂”中“聽音樂”重複了兩次；

猶豫：“我，嗯，我在學校時喜歡，嗯，看，啊，看書”。

2.4.2.2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Ratio of Pruned Length to Total Length, 簡稱為 RPL) 表示言語樣本中無助於理解言語內容的音節數與言語樣本總音節數之比。⁵⁶其公式表示為：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RPL) = 所剔除的、無助於語言理解的音節數 ÷ 言語樣本總音節數

例如：22 個音節 ÷ 222 個音節 = 0.1

無助於言語理解的音節表示被試自己否決的語言處理的次數，而這項指標與每百音節更改次數有一定的關係。

⁵⁵ 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頁 341-351。

⁵⁶ 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頁 341-351。

2.5 停頓界定

停頓對時間性指標的計算是極為重要的，這也是分析口語流利性及其發展的一個關鍵概念。⁵⁷雖然學術界對停頓分界點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劃分，但是基本上都認可停頓分為有填充停頓和無填充停頓。其中，有填充停頓是指說話人在說話過程中，發出的類似於“嗯”和“啊”等的語氣詞；無填充停頓也稱無聲停頓，指言語表達過程中的一段靜音停頓。⁵⁸

Goldman Eisler (1968) 最早劃分了一個具體的停頓界定。他將停頓界定為 0.25 秒，並認為凡是低於 0.25 秒的語音停頓都不能視為是語流的間斷。⁵⁹而 Griffiths (1991) 則認為不能將停頓進行過於精確的劃分，因為極短停頓有可能是猶豫產生的，也有可能是語音導致的。⁶⁰因此，Freed (1995) 建議採用 0.4 秒作為停頓的分界點。⁶¹

現國內外普遍採用 Raupach (1980) 的定義，即將停頓界定為發生於句內或句間的 0.3 秒及 0.3 秒以上的間歇。⁶²國內學者張文忠、吳東旭 (2001) 和郭修敏 (2007) 等在對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的定量研究中，也採用了 Raupach 的定義。

通過借鑒前人的研究和對實際語料的預處理，本次實驗研究決定採用 Raupach 對停頓的界定，即將停頓定義為達到 0.3 秒及 0.3 秒以上的有填充和無填充停頓。

⁵⁷ 張文忠，吳東旭，〈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頁 341-351。

⁵⁸ 郭修敏，〈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口語流利性量化測評〉，頁 91-94。

⁵⁹ Goldman Eisler, F. *Psycholinguistics: Experiments in Spontaneous Speech*, p83.

⁶⁰ Griffiths, R., "Pausological Research in an L2 Context: A Rationale, and Review of Selected Studies." *Applied Linguistics*, 12:4(1991), pp345-364.

⁶¹ Freed, B., "What Makes us Think That Students Who Study Abroad Become Fluent", In: Regan, V., (eds), *I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Social Context*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1998), p33.

⁶² Raupach, M., "Temporal Variable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Speech Production", In: Dechert, H. D., Raupach, M., (eds). *In Temporal Variables in Speech* (New York: Mouton, 1980), p27.

第三章 泰國、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

3.1 泰國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

泰國向來很重視漢語學習，爲了滿足日益增長的“漢語熱”，泰國政府與中國漢辦加大合作力度，在各地區都開設了孔子課堂和孔子學院，更是有無數漢語教師志願者被派往泰國向當地人教授漢語。參與該部分實驗的 20 名泰國小學生是從各個班級裏挑選出來的優秀生，平均母語水平為中等偏上。在對這些泰國小學生進行漢語教學的過程中，漢語教師會發現泰國小學生在使用漢語時大多帶有母語遷移性質的表現，這是由於母語經驗對第二語言習得的影響造成的。

漢語和泰語都是屬於漢藏語系的語言，都是孤立語，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從語法方面來看，漢語和泰語都不依賴形態表達意義，而詞序和虛詞卻是表達語法意義的重要手段。但是，無論相似程度有多高，漢語和泰語畢竟還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二語習得理論中也提到，當學習者的母語和目的語間存在“決定性相似度”時，即當兩種語言的等值項或者等值結構之間存在一些相似點時，學習者母語對其目的語的干擾也更容易出現。此外，因為漢語和泰語的相似度比較高，當泰國學生，特別是初級階段的學生在漢語習得過程中遇到困難時，自然而然會回到母語中去尋求幫助，用舊的知識來彌補新知識的不足，解決新知識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泰國學生因為受母語影響，即在母語遷移作用下產生的偏誤是很明顯的，具用研究價值。⁶³

泰語的基本語序和漢語一致，即主語—謂語—賓語。例如：1) 你是老師。

คุณคือคุณครู 2) 學生做作業。นักเรียนทำการบ้าน

ฉันรักแม่ (我+愛+媽媽)和 แม่ รักฉัน(媽媽+愛+我)，這兩個句子中的“我”和“媽媽”位置不同，謂語動詞都是“愛”，句法結構都是“主語—謂語—賓語”，但是語義關係卻不一樣，這一點和漢語是一樣的。

那麼，泰語中幾種基本結構類型的詞序排列是否也和漢語一致？下面通過幾個例子來看一看。根據劉月華的《實用現代漢語語法》(修訂版)，詞與詞之間的句法結構關係可分為以下五類：⁶⁴

(1) 主謂關係

漢語：我笑 泰語：ฉันยิ้ม 我笑

(2) 動賓關係

漢語：喝水 泰語：ดื่มน้ำ 喝水

(3) 偏正關係

a. 漢語：泰國老師；她的朋友

⁶³ 華玉明，黃艷梅，〈泰語干擾和對泰漢語教學對策〉，《邵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頁12-16。

⁶⁴ 劉月華，《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2-130。

泰語:อาจารย์ ไทย 老師 泰國; เพื่อนของเขา 朋友的她

b. 漢語:一起去; 慢慢地走

泰語:ไปด้วยกัน 去一起; เดินช้า ๆ 走慢慢

(4) 補充關係

漢語:高興極了; 吃不完

泰語:ดีใจมาก 高興極了; กินไม่หมด 吃不完

(5) 聯合關係

漢語:爸爸和媽媽; 白色或黑色

泰語:พ่อ กับ แม่ 爸爸和媽媽; สีขาวหรือดำ 白色或黑色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漢語和泰語中,詞與詞組合次序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偏正結構中。我們知道,這種詞與詞的組合也就是短語,它是造句的材料,是句子的構件單位。而且,漢語里短語的結構類型和句子中的句法結構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說,我們從以上短語比較中得出的漢語和泰語的差異可以擴展到對句子差異的推測中。⁶⁵

3.1.1 流利性測量指標

3.1.1.1 語速 (SR)

表 3-1 不同母語背景的語速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泰國小學生
平均語速	總	113.1	51.72
	Std	25.582	7.264
	女性	97.38	49.56
	Std	21.238	9.445
	男性	128.82	53.88
	Std	19.529	3.44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F_{(1, 39)}=161.445$, $p=.000$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跟泰語母語者的語速差異性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說話的語速明顯快於泰國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也極為顯著($F_{(1, 39)}=13.700$, $p=.000$ ***),說明無論男性兒童的漢語語速明顯大於女性兒童。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很顯著($F_{(1, 39)}=7.879$, $p:.008$ **).

3.1.1.2 發音速度 (AR)

表 3-2 不同母語背景的發音速度

⁶⁵ 林勇明,〈泰國學生漢語定語順序的偏誤分析及其習得順序〉,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00年,頁3-28。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泰國小學生
發音速度	總	2.705	2.066
	Std	.242	.326
	女性	2.556	1.906
	Std	.122	.201
	男性	2.854	2.226
	Std	.244	.357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67.455$,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泰語母語者的發音速度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說漢語的發音時間內每秒產出的音節數明顯多於泰國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15.774$, $p=.000$ ***), 說明無論母語背景是漢語還是泰語，男性兒童的漢語發音速度都明顯大於女性兒童。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0.020$, $p=.888$)。

3.1.1.3 發音時間比 (PTR)

表 3-3 不同母語背景的發音時間比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泰國小學生
發音時間比	總	.691	.423
	Std	.118	.058
	女性	.633	.434
	Std	.123	.057
	男性	.748	.412
	Std	.082	.059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99.780$,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泰語母語者的發音時間比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說漢語的發音時間比率遠遠大於泰國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3.015$, $p=.091$),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的發音時間比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 ($F_{(1, 39)}=6.543$, $p=.015$ *), 說明男性中國小學生比男性泰國小學生的發音時間比明顯高，女性中國小學生也比女性泰國小學生的發音時間比顯著高一些。

3.1.1.4 平均語流長 (MLR)

表 3-4 不同母語背景的平均語流長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泰國小學生
平均語流長	總	5.232	2.188
	Std	1.888	.289
	女性	5.061	2.143
	Std	2.17	.266
	男性	5.403	2.232

	Std	1.659	.317
--	-----	-------	------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48.571$,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泰語母語者的平均語流長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平均每秒說漢語的語流長度遠遠大於泰國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243$, $p=.625$),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的平均語流長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0.084$, $p=.774$)。

3.1.1.5 平均停頓長 (ALP)

表 3-5 不同母語背景的平均停頓長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泰國小學生
平均停頓長	總	.874	1.483
	Std	.519	.291
	女性	1.148	1.501
	Std	.617	.315
	男性	.6	1.464
	Std	.146	.28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25.534$,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泰語母語者的平均停頓長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平均每秒停頓的長度遠遠小於泰國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顯著 ($F_{(1, 39)}=5.900$, $p=.020$ *),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的平均停頓長有顯著差異，男性兒童平均停頓長較短。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 ($F_{(1, 39)}=4.502$, $p=.041$ *)。

3.1.1.6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R100)

表 3-6 不同母語背景的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泰國小學生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總	.445	4.043
	Std	.774	3.044
	女性	.675	4.676
	Std	1.012	3.353
	男性	.215	3.41
	Std	.351	2.727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26.121$,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泰語母語者的音節更改次數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每百音節更改次數明顯少於泰國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1.503$, $p=.228$),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的每百音節更改頻率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328$, $p=.571$)。

3.1.1.7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RPL)

表 3-7 不同母語背景的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泰國小學生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總	.006	.058
	Std	.009	.047
	女性	.007	.062
	Std	.011	.045
	男性	.005	.054
	Std	.009	.05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22.712$,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泰語母語者的剔除音節數比例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剔除音節數量遠遠少於泰國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210$, $p=.650$),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在剔除音節數比例上沒有明顯的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076$, $p=.785$)。

3.2 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

坦桑尼亞是非洲的首都，隨著中非貿易合作不斷增多，坦桑尼亞和中國兩個國家的語言文化融合進程也勢不可擋。在坦桑尼亞學習漢語的人數占據非洲漢語學習者總數的一半以上，這就需要對外漢語教學界在實踐和研究兩方面互相促進，針對以斯瓦希里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施行相應的有效教學模式。

斯瓦希里語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語借詞，連語言的名稱“斯瓦希里”都來自阿拉伯文：سواحل “瀕海地區”。如同所有的班圖語言一樣，斯瓦希里語法把名詞劃入幾種類別，這些類別是由前綴表現出來的。按照 Meinhof 的系統，班圖語言中最多有 22 種類別，具體語言至少有其中的 10 種。在斯瓦希里語中一共有 15 種名詞類別。單數帶有 m-前綴/復數帶有 wa-前綴的類別中的名詞都表示人類。例如：m-toto “孩子”，復數 wa-toto “孩子們”名詞的單數 ki-前綴在復數中變成 vi-前綴。連阿拉伯語借詞都遵守這條規律：kitabu “書”（阿拉伯語：kitāb）的復數是 vitabu，詞根的第一個音節被重新分析為前綴。動詞的不定式有 ku-前綴，例如：ku-soma “閱讀”。

參與本研究的 20 名坦桑尼亞小學生成績都十分優秀，也同樣具有較高的母語水平。在對比分析假設理論和中介語理論框架下，斯瓦希里語對漢語口語流利性的影響不容小覷，但並沒有確定的研究結果表明 L1 跟 L2 差異越大，L2 就越容易被習得。下面我們還是要從客觀測量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指標來入手。

3.2.1 流利性測量指標

3.2.1.1 語速 (SR)

表 3-8 不同母語背景的語速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	-------	---------

平均語速	總	113.1	77.97
	Std	25.582	20.37
	女性	97.38	77.58
	Std	21.238	22.725
	男性	128.82	78.36
	Std	19.529	18.953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28.902$, $p=.000$ ***), 說明中國小學生的漢語平均語速遠遠大於母語為斯瓦西裡語的坦桑尼亞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顯著 ($F_{(1, 39)}=6.078$, $p=.019$ *), 男性兒童說漢語的語速明顯較快。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 ($F_{(1, 39)}=5.504$, $p=.025$ *).

3.2.1.2 發音速度 (AR)

表 3-9 不同母語背景的發音速度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發音速度	總	2.705	2.871
	Std	.242	.328
	女性	2.556	2.779
	Std	.122	.254
	男性	2.854	2.962
	Std	.244	.38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3.874$, $p=.057$), 說明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發音速度跟漢語母語者沒有明顯差異。性別的主效應很顯著 ($F_{(1, 39)}=8.180$, $p=.007$ **), 說明無論母語背景是漢語還是斯瓦西裡語，男性兒童的漢語發音速度都明顯大於女性兒童。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468$, $p=.498$).

3.2.1.3 發音時間比 (PTR)

表 3-10 不同母語背景的發音時間比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發音時間比	總	.691	.451
	Std	.118	.091
	女性	.633	.459
	Std	.123	.098
	男性	.748	.442
	Std	.082	.087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58.906$,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斯瓦西裡語母語者的發音時間比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說漢語的發音時間比率遠遠大於坦桑尼亞小學生。性別的

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2.455, p=.126$),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的發音時間比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 ($F_{(1, 39)}=4.455, p=.042 *$), 說明男性中國小學生比男性坦桑尼亞小學生的發音時間比明顯高, 女性中國小學生也比女性坦桑尼亞小學生的發音時間比顯著高一些。

3.2.1.4 平均語流長 (MLR)

表 3-11 不同母語背景的平均語流長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平均語流長	總	5.232	3.034
	Std	1.888	.806
	女性	5.061	3.228
	Std	2.17	1.086
	男性	5.403	2.839
	Std	1.659	.33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 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22.095,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斯瓦西裡語母語者的平均語流長差異非常明顯, 中國小學生平均每秒說漢語的語流長度遠遠大於坦桑尼亞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003, p=.960$),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的平均語流長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611, p=.440$)。

3.2.1.5 平均停頓長 (ALP)

表 3-12 不同母語背景的平均停頓長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平均停頓長	總	.874	1.343
	Std	.519	.428
	女性	1.148	1.39
	Std	.617	.391
	男性	.6	1.296
	Std	.146	.479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 母語背景的主效應很顯著 ($F_{(1, 39)}=11.217, p=.002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斯瓦西裡語母語者的平均停頓長差異非常明顯, 中國小學生平均每秒停頓的長度遠遠小於坦桑尼亞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顯著 ($F_{(1, 39)}=5.254, p=.028 *$),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的平均停頓長有顯著差異, 男性兒童平均停頓長明顯較短。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2.628, p=.114$)。

3.2.1.6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R100)

表 3-13 不同母語背景的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每百音節 更改次數	總	.445	3.801
	Std	.774	3.347
	女性	.675	2.523
	Std	1.012	1.925
	男性	.215	5.079
	Std	.351	4.039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21.282$,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斯瓦西裡語母語者的音節更改次數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每百音節更改次數明顯少於坦桑尼亞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2.075$, $p=.158$),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的每百音節更改頻率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 ($F_{(1, 39)}=4.297$, $p=.045$ *), 說明男性中國小學生比男性坦桑尼亞小學生的音節更改次數明顯更少，女性中國小學生也比女性坦桑尼亞小學生的音節更改次數顯著少一些。

3.2.1.7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RPL)

表 3-14 不同母語背景的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母語背景		中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剔除音節 數與總音 節數之比	總	.006	.068
	Std	.009	.057
	女性	.007	.049
	Std	.011	.039
	男性	.005	.087
	Std	.009	.068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24.210$, $p=.000$ ***), 說明兒童漢語母語者與兒童斯瓦西裡語母語者的剔除音節數比例差異非常明顯，中國小學生剔除音節數量遠遠少於坦桑尼亞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2.041$, $p=.162$), 說明男性兒童與女性兒童在剔除音節數比例上沒有明顯的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2.519$, $p=.121$)。

3.3 泰國、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的差異

3.3.1 流利性測量指標

3.3.1.1 語速 (SR)

表 3-15 不同母語背景的語速

母語背景		泰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平均語速	總	51.72	77.97
	Std	7.264	20.37

	女性	49.56	77.58
	Std	9.445	22.725
	男性	53.88	78.36
	Std	3.44	18.953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28.221$, $p=.000$ ***), 說明母語為斯瓦希里語的小學生漢語平均語速遠遠大於母語為泰語的小學生, 但個體差異比較大 (坦桑尼亞小學生語速標準差 $Std=20.37$)。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266$, $p=.609$), 說明兩個國家的男性兒童說漢語的語速與女性兒童沒有明顯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128$, $p=.722$)。

3.3.1.2 發音速度 (AR)

表 3-16 不同母語背景的發音速度

母語背景		泰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發音速度	總	2.066	2.871
	Std	.326	.328
	女性	1.906	2.779
	Std	.201	.254
	男性	2.226	2.962
	Std	.357	.38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68.802$, $p=.000$ ***), 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發音速度非常明顯地超過了泰國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顯著 ($F_{(1, 39)}=6.724$, $p=.014$ *), 說明無論母語是聲調語言還是非聲調語言, 男性兒童的發音速度明顯較快。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499$, $p=.485$)。

3.3.1.3 發音時間比 (PTR)

表 3-17 不同母語背景的發音時間比

母語背景		泰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發音時間比	總	.423	.451
	Std	.058	.091
	女性	.434	.459
	Std	.057	.098
	男性	.412	.442
	Std	.059	.087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1.268$, $p=.268$), 說明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發音時間比沒有顯著差異。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638$, $p=.430$), 男性兒童跟女性兒童的發音時間

比也沒有明顯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011, p=.919$)。

3.3.1.4 平均語流長 (MLR)

表 3-18 不同母語背景的平均語流長

母語背景		泰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平均語流長	總	2.188	3.034
	Std	.289	.806
	女性	2.143	3.228
	Std	.266	1.086
	男性	2.232	2.839
	Std	.317	.33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極其顯著 ($F_{(1, 39)}=19.610, p=.000 ***$)，說明泰語為母語的小學生漢語平均語流長遠遠小於母語為斯瓦西裡語的坦桑尼亞小學生。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617, p=.438$)，說明外國男性兒童說漢語的平均語流長與女性兒童沒有明顯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1.565, p=.219$)。

3.3.1.5 平均停頓長 (ALP)

表 3-19 不同母語背景的平均停頓長

母語背景		泰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平均停頓長	總	1.483	1.343
	Std	.291	.428
	女性	1.501	1.39
	Std	.315	.391
	男性	1.464	1.296
	Std	.28	.479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1.391, p=.246$)，說明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的漢語平均停頓長沒有顯著差異。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307, p=.583$)，男性兒童跟女性兒童的平均停頓長也沒有明顯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058, p=.811$)。

3.3.1.6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R100)

表 3-20 不同母語背景的平均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母語背景		泰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總	4.043	3.801
	Std	3.044	3.347
	女性	4.676	2.523
	Std	3.353	1.925

	男性	3.41	5.079
	Std	2.727	4.039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 = .061, p = .807$)，說明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在更改音節次數方面沒有顯著差異。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 = .430, p = .516$)，男性兒童跟女性兒童的每百音節更改次數也沒有明顯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 = 3.775, p = .060$)。

3.3.1.7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RPL)

表 3-21 不同母語背景的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母語背景		泰國小學生	坦桑尼亞小學生
剔除音節 數與總音 節數之比	總	.058	.068
	Std	.047	.057
	女性	.062	.049
	Std	.045	.039
	男性	.054	.087
	Std	.05	.068

二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母語背景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 = .372, p = .546$)，說明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剔除音節比例方面沒有顯著差異。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 ($F_{(1, 39)} = .838, p = .366$)，男性兒童跟女性兒童的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也沒有明顯差異。母語背景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_{(1, 39)} = 1.969, p = .169$)。

第四章 實驗結果分析討論

4.1 學習者漢語口語流利性特徵分析

本章分為三小節，先將兩個實驗組——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分別與對照組——漢語母語小學生進行各項口語流利性指標的分析探究，再專門對比兩個實驗組的數據從而得出本實驗的最終結果。

4.1.1 泰國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結果分析

為了更加清晰地觀察分析泰國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差異，本節將上一章的有關統計結果匯總成下表：

表 4-1 泰國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

流利性 指標	顯著性 p	母語背景	性別	母語和性別交 互作用
語速 (SR)	***	***	***	**
發音速度 (AR)	***	***	***	
發音時間比 (PTR)	***			*
平均語流長 (MLR)	***			
平均停頓長 (ALP)	***		*	*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R100)	***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 數之比 (RPL)	***			

該部分實驗通過對比中國小學生和泰國小學生的七項口語流利性指標發現，中國小學生的口語流利水平的各項表現明顯好於泰國小學生。無論是五項時間性指標還是兩項表達性指標，同年齡段的漢語母語者說普通話的語速、發音速度都明顯快於泰語母語者。前者的音節產出時間明顯更長、連續說話的平均字數也明顯更長、停頓和更改等非流利現象明顯更少，空白停頓的時長也明顯短於後者。可見在母語同為聲調語言的泰國小學生說話者中，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被習得的初期，除了音段音位（聲母、韻母）和聲調等表現一定會存在巨大差異外，韻律等語流特徵也明顯達不到同年齡段的母語者水平，說明第一語言流利性與第二語言流利性很可能無關，第二語言的發音流暢度明顯受到第二語言的實際水平影響。類似的觀點在 Tracey M. D. 等（2009）研究漢語母語者和斯拉夫語母語者的口

語流利性發展差異中有所體現，他們發現由於漢語有聲調，使得發音時韻母時長比斯拉夫語跟英語都長，所以導致漢語母語者的口語流利性發展相對而言更加緩慢了。⁶⁶但是，和漢語同為聲調語言的泰語具有的相似聲調範疇這個母語背景因素是否對泰國小學生習得漢語流利性有促進作用我們還無法得知，必須通過對比非聲調語言母語者的漢語口語流利性表現才能知曉。

整體來看，無論是中國小學生還是泰國小學生，男性發音人的語速、發音速度都明顯快於女性發音人，而男性小學生和女性小學生在其他特徵如有效說話時長、停頓次數、重複和修改等非流利性現象出現的頻率都差別不大。說明在聲調語言系統中，無論是母語者還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性別都對小學生說話速度有顯著影響。男生說漢語時聽上去更快，而同時他們重複或修改單詞的現象並沒有比女生更多，這體現了語流發展在性別上的不平衡性。這與陳默（2012）的研究發現不同，她的實驗結果是中國發音人的口語流利性特徵不存在性別差異，美國發音人除了停頓時長外其他特徵也不存在性別差異。她認為這是由於男性和女性學習者的言語系統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都有其獨特的轉變。⁶⁷

母語背景和性別因素的交互作用結果顯示：語速和平均停頓長這兩項表現一致，中國男孩說普通話明顯比中國女孩和泰國男孩語速更快、空白停頓時間更短，同時中國女孩和泰國男孩漢語口語語速又顯著快於泰國女孩。更具體來看，語速上表現的差異性比平均停頓長更加顯著。中國男孩的發音速度明顯快於泰國男孩和中國女孩。發音時間比、平均語流長、每百音節更改次數以及剔除音節比例都是母語背景佔主導影響因素，中國實驗組的這四項口語流利性水平明顯高於泰國實驗組，其中發音時間比這項指標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泰國實驗組的表現都顯著落後於中國實驗組的表現。

4.1.2 坦桑尼亞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結果分析

為了更加清晰地觀察分析坦桑尼亞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的漢語口語流利性差異，本節將上一章的有關統計結果匯總成下表：

表 4-2 坦桑尼亞小學生和中國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

流利性 指標 \ 顯著性 p	母語背景	性別	母語和性別交互作用
語速 (SR)	***	*	*
發音速度 (AR)		**	
發音時間比 (PTR)	***		*
平均語流長 (MLR)	***		

⁶⁶ Tracey M. D.,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Fluency and L2 Fluency Development." pp533-557.

⁶⁷ 陳默, <美國留學生漢語口語產出的流利性研究>, 頁 17-24。

平均停頓長 (ALP)	**	*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R100)	***		*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數之比 (RPL)	***		

本研究通過對比坦桑尼亞小學生和泰國小學生的七項口語流利性指標，意料之外地發現坦桑尼亞孔子課堂的孩子們整體上說漢語的發音速度跟漢語母語者已經沒有差別了，雖然這種反常結果很大程度上個體差異引起的，但我們難免會推測母語為斯瓦希里語的漢語學習者可能不需要後天努力，發出所有音節的總時間內平均每秒所發出的音節數就能夠和漢語母語者的表現一樣好了。主要原因應該是這些小學生說自己的母語斯瓦希里語時也有比較快的發音速度的習慣導致的，這跟同年齡段的母語為泰語的漢語學習者表現有明顯差異，說明發音速度這一項流利性指標與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母語流利性有關。類似的觀點，Tracey M. D. 等人 (2009) 的研究也發現二語學習者在初期的口語測試任務中 L1 和 L2 的流利性程度明顯具有正相關性。也就是說在學習早期階段，母語流利性水平越高的二語學習者能產出越流暢的第二語言話語。⁶⁸

無論是中國男生還是坦桑尼亞男生，在語速、發音速度和平均停頓長三項表現上都好與兩個國家的女性發音人。其他四項指標跟性別無關，女生的發音時間比、平均語流長、每百音節更改次數以及剔除音節數等表現都和男生沒有明顯差異。這和泰國小學生情況幾乎一致，說明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語速、發音速度和平均停頓長與性別有關，所有實驗者中男生說話聽起來速度更快、停頓時間更短。當然這並不能說明男生的整體流利性水平就要高於女生，因為有的男生可能重複說某些詞語的次數比較多，例如下面截取的一段編號為 2 的坦桑尼亞男生的口語錄音：“我在家時在學校喜歡，學漢語，唱歌打籃球爸爸媽媽禮拜，不喜歡去學習，踢足球，看電視。”這個坦桑尼亞男孩雖然發音速度較快、產出的音節數量較多，但他的漢語韻律節奏明顯比較混亂，再加上濃重的外國口音 (foreign accent)，所以整體上不會給人口語流利的感覺。

母語背景和性別因素的交互作用結果顯示：語速和平均停頓長這兩項表現一致，中國男孩說漢語明顯比中國女孩和坦桑尼亞男孩語速更快、空白停頓時間更短，同時中國女孩和坦桑尼亞男孩口語語速又顯著快於坦桑尼亞女孩。更具體來看，語速上表現的差異性比平均停頓長更加顯著。祇有發音速度這一項指標表現為中國和坦桑尼亞的全部男性實驗者明顯好於全部女性實驗者。而從發音時間比、平均語流長、每百音節更改次數和剔除音節比例這四項指標的兩國實驗者表現來看，母語背景是主要因素，中國小學生所有發音者這四項反映的流利性水平都明顯高於坦桑尼亞兒童發音者。若要更具體來看，在發音時間比和每百音節更改次數上表現的差異性要比平均語流長和剔除音節比例這兩項指標更加顯著。一些研究者認為母語停頓特徵會影響第二語言停頓特徵的習得。

⁶⁸ Tracey M. D.,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Fluency and L2 Fluency Development.” pp533-557.

4.1.3 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結果分析

本章的前兩小節分別將泰國小學生組和坦桑尼亞小學生組與漢語母語者對照組進行了對比，接下來我們將直接對比這兩個實驗組的結果（表 4-3）並得出具體的實驗結論。

表 4-3 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對比

流利性 指標	顯著性 p	母語背景	性別	母語和性別交 互作用
語速 (SR)	***			
發音速度 (AR)	***		*	
發音時間比 (PTR)				
平均語流長 (MLR)	***			
平均停頓長 (ALP)				
每百音節更改次數 (R100)				
剔除音節數與總音節 數之比 (RPL)				

由該表格可得知，泰國小學生漢語學習者僅僅在語速、發音速度和平均語流長三個指標上與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學習者存在著非常顯著的差異，其他各項指標兩組均無明顯差異。坦桑尼亞實驗組的口語語速明顯更快，產出的音節數更多，但語速這項指標上存在著很大的個體差異性，也就是說由於個別語速較快的實驗者影響了整體的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學習者的語速。例如編號為 7 的坦桑尼亞女生實驗者，她的語速非常快，但 65 秒的總說話時長內（包括停頓）一直在重複三句話：“我在家時喜歡唱歌，爸爸禮拜日不喜歡看電視，老師平時讀書，我在家時喜歡唱歌，爸爸禮拜日不喜歡看電視，老師平時讀書……”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考慮口語產出內容的準確度、複雜度，她的確可以保持較為順暢的語流，因為她不需要思考新的詞匯和句型。儘管泰國小學生漢語學習者在語流速度上比不上同齡的坦桑尼亞實驗組，但他們的外國口音更少，咬字清晰，重複或更改等非流利性表現也比較少，所以不能直接根據這三項指標就判斷泰國小學生的漢語水平不如同齡的坦桑尼亞小學生。

從性別影響因素來看，祇有發音速度是所有男性實驗組的表現明顯好於女性實驗組的，其他的六項指標均無顯著差異。這與前兩小節的結果分析一致，說明漢語口語的發音速度與性別有關，男孩的發音速度普遍快於女孩。

整體來看，在發音時間比、平均停頓長、每百音節更改次數以及剔除音節數比率這四項流利性指標上，泰國小學生漢語學習者和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學習者的表現差不多，說明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的初期，學習者和母語者最大的差

別是，學習者普遍具有較多次數的停頓、言語重複、更改等不自然的口語產出表現，而語速和語流長度可以憑藉某些原因（語言天賦、情緒心態、母語水平等）達到同母語者相近的水平。

4.2 針對漢語口語流利性的教學建議

在本文開頭提出的對外漢語口語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中，我們發現漢語學習者缺乏語流語感的培養訓練，針對學習者個體差異的教學措施也尚未完善。本研究通過考察外國小學生的語流任務表現，探討出不同實驗結果背後的個體差異原因，進而針對性地提出有效的對外漢語口語教學建議。口語的各類非流利現象廣泛地存在于外國學生的口語表達中，嚴重影響了學生口語的流利性。而隨著口語的流利性越來越成為衡量學生口語水準的重要指標，如何在實際的對外漢語教學中儘量減少學生在口語表達中出現的非流利現象，提高學生口語的流利性，這也就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接下來將在定量和定性考察初級階段外國小學生漢語口語的非流利現象所得的分析結論的基礎之上，提出針對漢語口語流利性的教學建議。

4.2.1 給予重視，加強訓練

也許有人會認為雖然非流利現象影響了口語的流利性，但是這些非流利現象在實際的言語交際中具有一些不可或缺的交際功能。例如像停頓、添加和重複這三個可同時劃為一個大類的非流利現象就能夠在言語表達遇到困難時，為言語計畫爭取時間。另外這三種非流利現象還經常伴隨出現在自我修正前，為學生進行自我修正準備了時間。同時自我修正這類非流利現象更是在提高口語的準確性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些人認為不必對外國學生口語中的非流利現象錙銖必較，即便漢語的母語者同樣也會在口語表達時出現像停頓、添加、重複和自我修正這樣的非流利現象。這樣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當然我們並不否認非流利現象所具備的交際功能，但是這些功能並不能消除非流利現象對口語流利性的影響。所以在實際的對外漢語教學中，教師和學生都應該給予口語的非流利現象更多的關注，並且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減少非流利現象，從而提高口語的流利性。說到提高口語流利性的措施，第一章已闡述過的套語的使用和話語的複述這兩種方法都在學者的研究中被證明是有效的。所以當學生在課堂上進行口語表達時，教師應該指導學生適當地使用一些套語，並有意識地運用重複練習法來提高學生的口語流利性。Goldman Eisler, F (1968) 首次運用實驗來考查重複練習作用。他讓被試重複在無時間限制的情況下描述同一幅漫畫多達六次，結果發現，隨著重複次數的增加，被試描述的內容增多，而停頓時間卻減少了。⁶⁹Hieke (1981) 則對二十九位英語學習者進行了長達十二周的聽念練習測試。在轉寫並分析了相關錄音後，他發現從第一周到第十二周，學習者在聽念練習中的語速逐漸增加而猶豫等現象逐漸減少。⁷⁰而 Maurice (1983) 設計了一種重複練習法——4/3/2 訓練法。他讓被試分別面對三個不同的物件講述一件內容相同的事情，其中每次講

⁶⁹ Goldman Eisler, F. *Psycholinguistics: Experiments in Spontaneous Speech*, p89.

⁷⁰ Hieke, A. E. "Audio-lectal practice and fluency acquisition.", pp189-194.

述時間呈四分鐘、三分鐘、兩分鐘遞減。研究發現，在時間遞減的同時，被試在口語上的流利性和準確性卻能達到越來越高的水準。⁷¹

4.2.2 建立體系，量化測評

在實際的口語測試中，對學生口語流利性的評價往往依靠的是考官的聽覺感受，很少存在量化測評的評價體系，所以對學生口語評價的主觀性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產生的對學生口語流利性評價的結果是否真實地反映了學生的口語水準，在這一點上是值得懷疑的。如何在這樣的主觀評價中加入更多的客觀性，使評價的結果能夠更加真實有效呢？既然非流利現象影響了口語的流利性，那麼就可以根據各類非流利現象對口語流利性影響的嚴重程度以及出現次數的多少，建立一個對學生口語流利性進行量化測評的評價體系。當然科學體系的建立必須基於更多的相關研究，但是作為在一線肩負教學任務的對外漢語教師來說，應該嘗試性地在對學生進行口語考試時實行這樣量化測評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依賴自己聽覺上的感受來評價學生口語的流利性。針對本文研究顯示，學生口語中的非流利現象會在性別因素的影響下產生一定的差異。既然存在差異，那麼教師就應當在實際的教學中重視這種差異，並且有針對性地採取方法提高男女學生口語的流利性。研究發現在女生的口語表達中，自我修正出現的次數要明顯多於男生。因此對於女生來說，自我修正現象的存在無疑會提高口語的準確性，但勢必也會影響到口語的流利性；而反觀男生，口語的準確性與女生相比可能會略遜一籌，但在流利性方面卻可能會更好一些。面對這樣的情況，教師在女生的口語訓練中應該在保證準確性的前提下更加注重針對流利性的訓練，而對男生則應在流利性的基礎之上提高準確性。由此可見，口語的準確性和流利性並不能單列而論，只有均衡發展，才能從整體上提高學生的口語水準。⁷²

綜上所述，面對口語的流利性以及非流利現象這個在對外漢語的研究和教學中都未受到足夠重視的課題，教師首先應該在課堂教學中給予重視，加強訓練，並且有意識地針對不同性別的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其次教師還應該在測試評價中，儘量減少主觀性，積極建立量化的評價體系，進行相對客觀的評價。當然在教材的編寫方面，編寫者也應該在題目的編寫方面適當增加一些針對提高學生口語流利性的訓練。

⁷¹ Maurice, K. "The fluency workshop.", p29.

⁷² 施靜靜，〈中級階段外國學生漢語口語的非流利現象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3年，頁12-33。

第五章 結語

本篇文章探討了漢語口語流利性表現的母語影響差異，以漢語母語者為參照，定量定性地分析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這兩個實驗組的母語背景和性別因素對他們漢語口語產出的影響。

通過分析母語背景對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的初期，學習者和母語者最大的差別是，學習者普遍具有較多次數的停頓、言語重複、更改等不自然的口語產出表現，而語速和語流長度卻可以達到接近母語者的水平。說明母語背景跟第二語言口語的語速和語流長度無關，主要原因應該與學習者個體差異有關，有些人母語語速本身就快，影響了說話速度；有些人由於緊張、興奮等在綫進行任務時產生的心理因素導致了過快的語速。再加上本實驗的研究樣本範圍有限，數據不具有代表性，故還需要更多的相關研究來驗證。

通過分析性別對泰國小學生和坦桑尼亞小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的影響，本文研究發現漢語口語的某些流利性特徵與性別有關。無論是中國小學生、泰國小學生還是坦桑尼亞小學生，男生的語速、發音速度都明顯快於女生。這與陳默(2012)的研究發現不同，主要原因在於實驗者年齡不同。⁷³本實驗以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由於青少年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認知習慣和工作記憶能力，所以兩個實驗的結果相去甚遠。不考慮某些個人表現差異，男生性格更傾向於快速表達，而女生會更加細心考慮到語言產出的準確性。面對這樣的情況，教師在女生的口語訓練中應該在保證準確性的前提下更加注重針對流利性的訓練，而對男生則應在流利性的基礎之上提高準確性。由此可見，口語的準確性和流利性並不能單列而論，只有均衡發展，才能從整體上提高學生的口語水準。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由於本研究在人力物力等資源條件方面有限，小規模採樣可能給研究結果帶來片面性；本實驗僅僅從話語流利性角度測量漢語學習者的口語流利性指標，還缺少漢語母語者對他們的感知評分，也就無法從說話者和聽話者兩個角度互相驗證實驗結果。後續研究可以從以上方面進行補充，使漢語口語流利性的研究更加完善和系統化。

⁷³ 陳默，〈美國留學生漢語口語產出的流利性研究〉，頁 17-24。

參考文獻

1. 中文參考目錄

(1) 出版書籍

- 李泉,《對外漢語教材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劉月華,《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徐霄鷹,周曉兵,《泰國人學漢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王韞佳,〈跨語言語音對比與L2語音習得——CAH、PAM和SLM述評〉,北京:《第八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暨慶賀吳宗濟先生百歲華誕語音科學前沿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
- 吳中偉,《當代中文(斯瓦希里語版)》,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北京科海電子出版社,2011年。
- 朱川主編,《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對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年。

(2) 期刊論文

- 陳默,〈美國留學生漢語口語產出的流利性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2012),頁17-24。
- 陳默,〈英語母語者漢語朗讀流利度的教學研究〉,《華文教學與研究》第1期(2015),頁17-27。
- 付有杰,鄒長梅,〈塞林克和他的“過渡語”理論〉,《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1996),頁74-75。
- 郭修敏,〈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口語流利性量化測評〉,《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7期(2007),頁91-94。
- 華玉明,黃艷梅,〈泰語干擾和對泰漢語教學對策〉,《邵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6期。
- 胡偉傑,王建勤,〈第二語言口語認知流利性對口語能力的預測作用〉,《世界漢語教學》第1期(2017),頁105-115。
- 劉麗,〈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測定指標的研究〉,《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期(2012),頁138-140。
- 劉瑜,吳辛夷,〈漢語二語學習者口語產出的流利度研究〉,《華文教學與研究》第4期(2016),頁32-42。
- 魯健驥,〈關於對外漢語教學模式的對話〉,《華文教學與研究》第1期(2016),頁11-17。
- 繆海燕,孫藍,〈句子構造框架的使用與二語口語流利性發展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第9期(2006),頁265-271。
- 潘琪,〈中國學習者英語口語流利性和準確性相關性及其縱向變化規律的實證研究〉,《外語學刊》第4期(2013),頁100-106。

- 薛晶晶,〈作為第二語言的漢語語音教學模式構建的認知基礎〉,《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第1期(2017),頁97-99。
- 翟艷,〈口語流利性主觀標準的客觀化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5期(2011),頁79-86。
- 吳旭東,〈外語課堂口語發展理論模式(上)〉,《現代外語》第2期(1996),頁13-14。
- 吳旭東,〈外語課堂口語發展理論模式(下)〉,《現代外語》第1期(1997),頁67-68。
- 楊小彬,〈我國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成就與問題〉,《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1),頁31-34。
- 張莉,〈留學生漢語學習焦慮感與口語流利性關係初探〉,《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2001.8),頁44-49。
- 張文忠,〈國外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研究現狀〉,《外語教學與研究》第2期(1999.2),頁41-48。
- 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現代外語》第4期(2001),頁341-351。
- 周愛潔,〈論4/3/2活動對提高英語口語流利性和準確性的影響〉,《外語教學》第9期(2002),頁78-83。

(3) 學位論文

- 戴婷,〈泰國留學生漢語陳述句句重音聲學特徵〉,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 林勇明,〈泰國學生漢語定語順序的偏誤分析及其習得順序〉,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
- 繆靜怡,〈3/2/1訓練法下越南留學生漢語口語流利性個案研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 施靜靜,〈中級階段外國學生漢語口語的非流利現象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 楊琇敏,〈二語學習者語塊韻律與口語流利性的相關研究〉,中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 趙錚,〈漢語語塊和留學生漢語流利性的相關性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 周寶芯,〈泰國、印尼學習者漢語韻律習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2. 英文參考目錄

(1) 出版書籍

- Brumfit, C. *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 Roles of Fluency and Accu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0-131.

- Crystal, D. & R. Varley,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athology*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Press, 1993), pp25-67.
-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 pp33-35.
- Faerch, C., Haastrup, K. & R. Phillipson. *Learner Language and Language Learning* (Multilingual Matters L TD, 1984), pp11-187.
- Goldman Eisler, F. *Psycholinguistics: Experiments in Spontaneous Speech*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68), p89.
- Krashen, 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Pergamon Press, 1982), p156.
- Lenneberg, 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ew York: Wiley, 1967), pp63-95.
- Mackey, W. F. *Language Teaching Analysis*. Longman Group. Translated by Wang Dexing et al. (1990), Beijing Languages Institute Press, 1965, pp87-132.
- Segalowitz, N. *Cognitive Bases of Second Language Fluen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34-60.
- Selinker, L., *Rediscovering Interlanguage* (Longman, 1992), pp45-120.

(2) 期刊論文

- Arevart, S., Nation, P. "Fluency Improve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 *RELC Journal*, 1(1991), pp84-95.
- Asher, J. & Garcia, R. "The optimal age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53(1969), pp334-341.
- Carroll, J. D. and Arabie, P.,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nu. Rev. Psychol*, 31(1980), pp607 - 649.
- Chandrasekaran, B., Gandour, J. T., and Krishnan, A., "Neuroplasticity in the processing of pitch dimensions: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of the mismatch negativity," *Restor. Neurol. Neurosci*, 25(2007a), pp195 - 210.
- Chandrasekaran, B., Sampath, P. D., Wong, P. C. M., "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cue-weighting and lexical tone learning."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28: 1(2010), pp456-465.
- Fathman, A. "The relationship of age and second language productive ability." *Language Learning*, 25(1975), pp245-253.
- Fillmore, C. "On fluency." In C. Fillmore. D. Kempler & W. Wang (ed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bility and Language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p85-101.
- Foster, P., Skehan, P., "The Influence of Planning and Task Type on

-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8(1996), pp299–323.
- Francis, A. L., Ciocca, V., Ma, L., and Fenn, K., “Perceptual learning of Cantonese lexical tones by tone and non-tone language speakers,” *J. Phonetics*, 36(2008), pp268 – 294.
- Freed, B., “What Makes us Think That Students Who Study Abroad Become Fluent” , In: Regan, V., (eds), *I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Social Context*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1998), p33.
- Gandour, J., “Tone perception in Far Eastern languages,” *J. Phonetics*, 11(1983), pp149 – 175.
- Golestani, N., and Zatorre, R. J.,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phonology,” *Brain Lang*, 109(2009), pp55 – 67.
- Griffiths, R., “Pausological Research in an L2 Context: A Rationale, and Review of Selected Studies.” *Applied Linguistics*, 12:4(1991), pp345–364.
- Hieke, A. E. “Audio-lectal practice and fluency acquisition.”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4: 3(1981b), pp189–194.
- House, J . “Developing pragmatic fluency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8: 2(1996), pp225–252.
- Iverson P, Hazan V, Bannister K. “Phonetic training with acoustic cue manipulations: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teaching English vertical bar r vertical bar-vertical bar l vertical bar to Japanese adult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18:5(2005), pp3267–3278.
- Iverson, P., Kuhl, P. K., Akahane-Yamada, R., Diesch, E., Tohkura, Y., Kettermann, A., Siebert, C., “A perceptual interference account of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for non-native phonemes,” *Cognition*, 87(2003), ppB47 – B57.
- Lennon, P. “Investigating fluency in EFL: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Language Learning*, 40:3(1990), pp387–417.
- Lesson, R. “Fluency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5, p136.
- Maurice, K. “The fluency workshop.” *TESOL Newsletter*, 17: 4(1983), p29.
- Oyama, S. “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 non-native phonological system.”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5(1976),

pp261-283.

Pilar A., Jason Z. & Arturo E. H. "Age of Acq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in a second language independently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non-native speech."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5(2012), pp190-201.

Raupach, M., "Temporal Variable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Speech Production", In: Dechert, H. D., Raupach, M., (eds). *In Temporal Variables in Speech* (New York: Mouton,1980), p27.

Sajavaara, K. "Second language speech production: Factors affecting fluency." In Dechert and Raupach(eds.), 1987, pp55-109.

Schmidt. 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econd Language Fluency."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4:3(1992), pp357-385.

Seliger, H.W., Krashen, S. & Ladefoged, P. "Maturational constraints in the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accent." *Language Sciences*, 36(1975), pp20-22.

Towell, R., Hawkins, R., Bazergui, N., "The Development of Fluency in Advanced Learners of French." *Applied Linguistics*, 17:1(1996), pp90-101.

Tracey M. D., Murray J. M., Ronald I. T., Marian J.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Fluency and L2 Fluency Development." *SSLA*, 31(2009), pp533-557.

Weinert, R. "The role of formulaic langua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eview". *Applied Linguistics*, 16: 2(1995), pp180-205.

Wong, P. C. M., and Perrachione, T. K., "Learning pitch patterns in lexical identification by native English-speaking adults," *Appl. Psycholinguist.* 28(2007), pp565 - 585.